

追慕任老

[日本] 真柳诚撰, 梁永宣译, 梁嵘审核

近日,从梁永宣老师处得知,任应秋老师诞辰一百周年的纪念文集出版在即,邀请我写一篇怀念任老的文章,这对于敬慕不已的任老师是毫无异议的事。我和任老相识于三十年多年前,当时收藏的资料全部存放在与现居地茨城有一段距离的横滨家中,查找多有不便。于是决定,根据妻子从横滨家中带来的几张照片,以及矢数道明先生所写《明治117年汉方略史年表》一书中内容,略加入自己多年前的记忆,以此为基础来撰写此文。

我从1980年9月到1981年7月,在北京语言学院学习了现代汉语。同年9月一直到1983年7月,作为进修生到北京中医学院学习。在留学以前,从1976年开始,我学习了4年的汉方,同时自1977年起还学习了3年针灸学。当时也从事过简单的临床,又阅读了一些文革时期的中医学、中药学书籍后,对其中与本草相关的内容产生了很多疑问。于是在30岁的时候,虽已经成家,但还是决定到中国留学。

好像1981年夏天以前,北京中医学院的留学生宿舍安排位于东直门医院北侧的一个四合院中。在那年春天,我作为一名仍然学习语言的学生,因为听说那里食堂的菜肴非常好吃,就曾经前往过。在彼处认识了给留学生做辅导的梁嵘老师,当时她向我提出问题,如日本所说的东洋医学和汉方医学之间的差异是什么,等等。1972年中日两国邦交恢复正常化,直到1982年为止,在中国学习2年以上的日本留学生,包括中途退学的学生,一共有19名。但是来中国之前已经学习过汉方,而又属于日本东洋医学会员的日本留学生,我是第一人。或许是通过那段时间与梁嵘老师的交流,我知道了任老的名字,后来我也一直和她保持着学术方面的联系。

在中医学院一开始去进修生班听了中医基础等课程,但不到半个月就不想听了,于是便决定调换到本科生班学习。接下来的二年间,陆续学习了中药系开设的《中药鉴定学》、《炮制学》,中医系的《伤寒论》、《金匱要略》、《温病学》、《医古文》,以及《中医各家学说》等科目。我坚持按自己的想法往返于两个系别之间不断吸取知识。当时我是自费留学生,这么任性但也被允许了。

中医各家学说这门课程,最初由已是高龄的任老执教,当时,我几乎都听不懂。于是就问旁边的中国同学,他们说因为任老讲的是四川方言,也一样不明白,得知这样的情况我便安心了。之后,这门课由几位年轻的老师用普通话授课,便能听懂。在讲课过程中,老师们屡屡言及伤寒学派在日本的研究状况,听到这些内容我非常吃惊。于是马上被任老编撰的《中医各家学说》(上海科技出版社,1980年)一书之魅力所吸引,记忆中在旅行的火车上也在阅读这本书。它一点都不像艰涩的通年史教材,使我在医史研究方面大开眼界。多年后我的研究是以医家和医书为核心,注重探讨学术特征、成书背景和继承关系,就是因受到了任老学问的启发。

1981年10月1号,在北京中医学院礼堂召开了“中日伤寒论学术研讨会”,中国方面由任老以《研究<伤寒论>的流派》为题讲演,我受委托将其全文译为日语,后来,此文刊登在日本《中医临床》杂志增刊《日中伤寒研讨会论文集》(1982)。在翻译过程中,我曾就其文中引用的古文含义等,多次向任老请教,在答疑的过程受益良多。慢慢地我也能听懂任老的四川话了。

之后,我便经常去任老的研究室访问,学到了很多。有时,我对任老说:“(当时的)日本政府没将汉方医学作为正统医学,真令我气愤”。任老也回答:中国没有日本人编撰《中国医籍考》和《宋以前医籍考》那样的书,这也令他气愤。特别是在阅读伪满时期成书的《宋

以前医籍考》时觉得很苦恼。又提及丹波（多纪）父子的研究和文章，也非常有水平。听到这些话，我才略感高兴。期间，我还曾向任老询问杨上善和《太素》的历史。任老说，这个问题与日本相关的因素很多，所以不太清楚。这个印象我一直记忆犹新，因此之后开始思考研究《太素》的传承脉络，最近终于把相关问题都解释清楚了，这一点也多亏了任老当年的启发。

1978年，在日本东洋医学会学术总会，我与矢数道明老师初次见面。很巧合的是，两年后的1980年9月6日，我去中国留学时，在成田机场与刚从中国访问归来的矢数道明老师不期而遇。谈话中，我告诉矢数老师自己已经决定到北京中医学院留学，矢数老师听闻后，立刻给了我一张他的名片，并叮嘱我今后要向他介绍中国如何进行中医教育。后来，我只要在北京有所见闻，便会给矢数老师写信，他也会迅速给我回信。不仅如此，矢数老师也会询问一些问题。我便根据他的提问，做一些调查后再度回信。就这样，在我留学中国期间，二人不断地往来通信，多达50封以上。后来，我受到杂志社的委托，将这些信件内容整理成文，即《中国保存、日本刊行的〈伤寒论〉、〈金匮要略〉关系书目录》（汉方之临床第29卷9号及10号，1982）。

1982年春天亦或是夏天，我收到矢数老师的一封来信，他和大塚敬节老师共同编写的《近世汉方医学书集成》至第三期为止、全套100册的工作即将完结，作为纪念品他们想将这套房赠送给中国，向我询问最佳赠书地点。于是，我在建议送往各个中医学院和中医研究院图书馆的同时，也推荐了任老的研究室。由此，两位先生之间建立了尊敬友好的交流，这点令我记忆犹深。

1982年10月18日，在河南南阳召开了由中华全国中医学会举办、为期四天的“仲景学说学术研讨会”。日本东洋医学会访中代表团名誉团长是矢数老师，这此会议促成了他和任老的首次碰面。二人在短短几天交往中，结下了深厚的感情，这一记忆一直深深地印入我的脑海。本来我也要参加这个会议，任老几次出面，外事处都以“学生不可以参加国际会议”为由拒绝，未能参会也使我非常遗憾。但是，日本访中国代表团在归途中又在北京停留了几日，矢数老便把团员中的小曾户洋学兄介绍给我，我们一见如故，十分投缘。这也算是人生的另一种奇遇吧！

1983年1月24日，小曾户洋学兄再次来京访问了任老（图1）。同年矢数老师迎来了77岁喜寿，小曾户请任老为矢数老寿写一幅书法作品，任老马上挥毫泼墨完成了“矢数道明先生喜寿颂”的作品（图2）。其优美的行文和飘逸的字体，令矢数老师欣喜之情溢于言表，他也挥笔书写了一文（图3），后来由他的门人会刊登于1983年《矢数道明先生喜寿纪念文集》卷首，现在仍悬挂于矢数医院的候诊室前。

1983年5月14日，按原定计划任老准备应邀参加日本东洋医学会学术总会，并作为中华全国中医学会的代表进行特别讲演。但是从当年春天起，他身体出现不适。后来，听说他到西苑医院入院治疗。6月我曾去看望，言及1个月后我会结业归国，也希望能挥毫赠言。行前再次探望任老时，他写了“自强不息”四个字赠送我（图4），此外他还做了藏名诗，做了“才思敏捷谁如君……中日医学实同根”的七言律诗，在诗中将真、柳、诚三个字都包含在内。看到任老的诗，我欣喜若狂，马上把它送到荣宝斋中裱装，现在成为了我的家宝。而任老所题“自强不息”四字，则在我回国后挂在了研究室中，视为任老的遗训一直鞭策着我不断前行。

归国以后，在当时兼任北里东洋医学研究所医史学研究室室长的大塚恭男老师帮助下，允许我每周有一半的时间，到小曾户洋学兄研究室并排进行医史研究，旁边的屋子便是间中喜雄老师的针灸研究室。另外一半时间，还照顾我作为个人秘书到矢数老师家里给他整理藏书，在这段时间我受到了良好的待遇。1984年夏天，矢数老和间中老应中国卫生部邀请，参加10月23日举行的中日友好医院开院典礼，我作为随行人员一同前往。两位老师向卫生

部转达，约定在 23 日下午一同去探望病中的任老。

但是，10 月 17 日的上午，我从在中国留学的植地博子同学那里得到了任老的讣告，矢数老、间中老和小曾户洋学兄等人都十分愕然。本来定于 10 月 31 日举行葬礼，最终由任老家属和中医学院的多方考虑，为我们日本学者一行，安排在 23 日下午于东直门医院举行了任老的告别仪式，在灵安室面对着任老的遗体，大家都分别献花。矢数和间中两位老师一向任老惜别，他们之间有着大海一般的深情，我也满怀敬意地向对我有着学恩的任老献了花。

间中老师于 1989 年，矢数老师于 2003 年，大塚老师于 2009 年都分别离开了这个世界。我在日本和中国师事过或者说私淑的老师都先后离去了。我在梦想，他们几位有时会在天上欢谈吧。我现在每天虚度年华，已超过了师事大塚老师时的年龄。但是老师们各自的学问已成为我的血肉，成为我每天进行研究的动力。我非常尊敬两国老师的学问，也亲眼目睹了他们之间深刻的友情，这些美好的印象一直在我脑中徘徊，使我难忘终生。任老所写的“中日医学实同根”几个字，也时刻涌现在我的胸中。我由衷地期盼，我们以及后代应该更加深入地增进两国之间的学术交流和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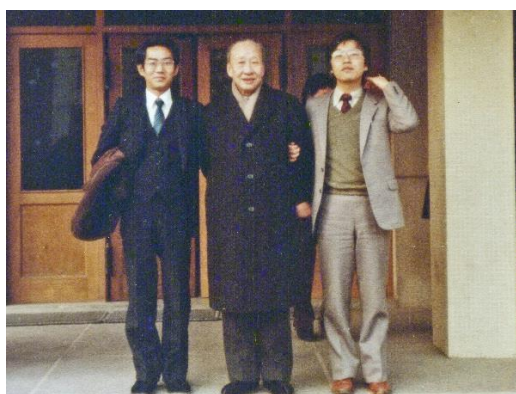


图 1



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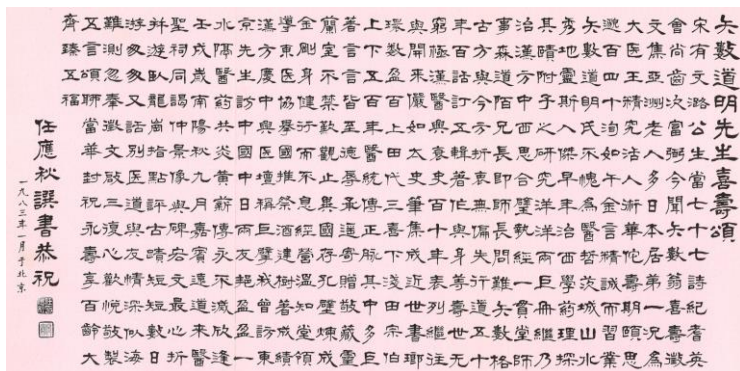


图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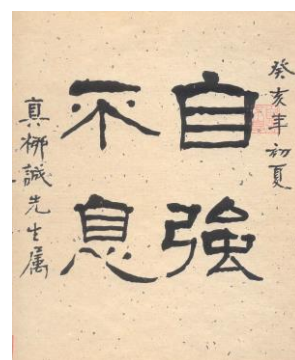


图 4

2014 年 6 月 14 日